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壮大市场竞争主体；出台反垄断审查重点行业清单，以结构性治理思路统筹开展竞争秩序整治。三是竞争政策不应局限于企业规模，重点关注市场份额扩张是否伴随价格加成抬升、劳动收入份额下滑。对份额持续走高、利润占比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明星企业”开展并购、排他性交易审查，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遏制市场集中挤压劳动收入。四是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最低工资动态调整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推动建立薪酬与劳动生产率、经营绩效、企业利润联动的激励机制，引导盈利改善的企业履行收入分配责任。

贸易冲突下企业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韧性效应
——基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场景

赵艳平　韩颜祯　梁正一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蔓延，部分国家相继设置技术壁垒，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造成显著冲击。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国际贸易规则变动与外部经贸风险、实现长效稳健发展，是国家治理、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领域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伴随全球科技竞争与产业格局的深刻变革，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量，持续出台并升级对华贸易、技术管控措施，对我国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跨境合作与技术创新发展形成不利影响。

关于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高管性格与能力、数字化水平、研发投入等企业自身特征以及政府采购等外部制度环境展开，但现有研究较少结合国际贸易冲突背景，尚未专门考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带来的现实冲击，也缺少对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现实举措的针对性分析。从现实情况看，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内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自身韧性、对

冲外部制裁的重要路径。据此，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外部冲击下，我国企业能否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置布局提升抗风险能力以及具体作用机制如何，是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

从理论层面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企业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可在遭遇国外技术封锁时快速启用替代技术与生产方案，保障经营生产的连续性，有效对冲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带来的技术冲击；另一方面能够依托新兴产业属性获取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专项政策支持，缓解出口管制引发的短期资金约束。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倒逼企业优化信息披露质量，稳定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规避恐慌性抛售导致的企业价值崩盘风险，帮助企业在贸易冲突与出口管制压力下掌握战略主动权。

本文立足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具体场景，借助手工收集整理的美国实体清单和我国企业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子公司的特色数据，研究国际贸易冲突下我国企业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韧性效应，主要发现：第一，受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冲击后，企业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水平越高，自身产品市场份额和资本市场价值受到影响的程度越小，呈现出韧性效应；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实现供应链自主可控、吸引政府资源支持，并提振产业链和资本市场投资者信心；第三，企业在自身行业上游设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子公司数量越多、规模越大时，上述效果更为明显；第四，韧性效应需要坚实的制度环境保障，在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创新、人才培养基础较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较高地区更加突出；第五，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上述韧性效应能够“稳就业”和“保税收”，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保持不变。

本文结合我国企业集团化经营的现实特征，通过手工整理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行业信息，更好地度量企业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水平，并基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场景，检验其对企业韧性的提

升效应，在产业布局测度与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层面形成了有益补充。本文依托手工整理的美国实体清单数据，聚焦企业事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行为，系统检验其在贸易冲突中的韧性赋能机制，补充了企业主动应对外部贸易风险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合我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战略目标，本文结论为激励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国际风险抵御能力、稳固产业链供应链话语权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强化企业前瞻性战略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面对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常态化以及关键技术供应风险上升的外部环境，应引导企业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由短期风险应对转向长期竞争战略，推动产业链韧性建设由“事后补救”向“事前布局”转变。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在自身行业上游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越强。因此，应引导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等产业链上游关键环节提前布局，尤其要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主营业务的纵向互补。同时，建立重点产业链风险监测和动态预警机制，帮助企业及时识别潜在“卡点”和“断点”，提高企业应对外部贸易冲突和供应链中断风险的主动性。

第二，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机制，降低企业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本与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且技术风险较高，面临较高资金约束。因此，应围绕“提前布局”和“上游布局”提高政策支持精准度。在财政税收方面，可依托现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对承担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链补短板任务的企业给予更加精准的支持，引导企业将资源持续投入产业链上游关键环节。在金融方面，发挥超长期特别国债、“两重”建设资金及政策性金融导向作用，对上游战略性新兴产业子公司数量多、资产规模大的企业优先给予低息贷款、首台套保险补偿与政府采购订单，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中长期融

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产业链整合，并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和长期资本重点支持具有较强上游布局能力和产业链带动能力的企业，缓解企业前瞻性布局面临的融资约束，使企业能够将短期外部冲击转化为长期产业升级动力。

第三，优化地方创新与要素配置环境，增强企业战略布局的韧性转化能力。本文研究发现，企业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韧性效应，在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创新、人才基础较好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这意味着，企业战略布局能否有效转化为风险抵御能力，还取决于地方制度环境能否持续提供创新资源和要素保障。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对企业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支持导向，改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资源配置和企业融资等配套环境，降低企业获取技术、资本和人才等关键要素的制度性成本。同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提高创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促进人才、资本等要素向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关键环节集聚，放大企业前瞻性布局的韧性效应。

外贸下乡：自贸试验区农村劳动力增收效应的空间断点研究

张鹏龙　刘天寒　田皓允　胡羽珊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乡村全面振兴是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战略支点。如何让开放红利更充分、更均衡地惠及农村部门与农村居民，既关系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质量，也是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现实问题。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以制度创新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载体，通过通关便利化、行政管理改革、市场准入优化和投资贸易便利化等方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可能经由产业扩张、企业集聚和劳动力需求增加，为农村居民创造就业和增收机会。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自贸区对企业、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影响，而其开放红利能否进一步跨越园区